

满族民间家谱满汉文体书写嬗变的历史叙事

何晓芳

摘要:满族入关前创制的满文,在清王朝建立后被确定为“国语”“国书”,不仅在清朝统治境内通行,而且成为东亚与欧洲国家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语言文字。但是,满文应用在清朝统治强盛时期却逐渐衰落,其动力机制来源于满族自身文化生存、发展的强烈需求,不以统治者政治意志为转移。本文以满族家谱书写从满文到汉文的嬗变,细说满族如何效仿汉族家谱形制,借用汉文完善家谱书写,再到完全融入汉文家谱文化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满族家谱 满汉文体 家谱与档册 满文姓名 嬗变

中图分类号: K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 - 434X (2021) 04 - 0063 - 13

努尔哈赤后金时期,为使“文移往来”简捷^①,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借用蒙古文创制满文,史称为老满文。皇太极时期命达海进行改进,这种改进的满文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满文,一般是指“新满文”。清王朝建立,将满文确定为国家通用文字,称为“国语”“国书(文)”,并伴随康乾盛世走向欧洲。因欧洲人学习满文比学习汉文容易得多,因此,他们往往借助于满文译本来阅读汉文古籍图书,并将这些满文图书译成欧洲语言^②,一度成为欧洲了解彼时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第一语言文字。近年来马腾^③出版了《近代早期满文在东亚与欧洲的流传:一种文字及其知识史》^④一书,该书侧重考察欧洲人学习满文在中西方文

作者简介:何晓芳,东北大学中国满学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学、满族历史与文化;辽宁,沈阳,110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19VJX026)。

①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原文:“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榜识厄儿得尼、刚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知。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

② 如,俄文本:《八旗通志》《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德文本:《性理精义》《三字经》《辽史》《四书》;法文本:《通鉴纲目》《金史》《易经》《三字经》;意大利本:《圣谕广训》《三字经》《通鉴纲目》等。

③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是清代学术和文化史,对满语言文字多有关注。

④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20年。该书讲述满语如何成为清代早期的官方语言,以及后来如何吸引中国、朝鲜、韩国、日本、俄国、德国和法国等中外学者研究满语。

化交流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满文在亚洲东部的朝鲜、日本的流传情况。

本文从满族民间家谱满汉文体嬗变视角切入,试图对曾广泛流传于欧洲和东亚的满语文其消退的历史过程进行解读,并由此探讨一些有关人类语言和文化保护的共同问题。

满族民间家谱主要指相对于清代官修家谱而言由满族人私家修撰的家谱,这类家谱充分体现了满汉文体书写嬗变的历史过程。满族民间修撰家谱大约经历三次高潮:第一次为乾隆嘉庆时期,《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次为光绪时期,八旗人口大量繁衍,需要修撰家谱以正伦理、别行辈、通婚姻;第三次为民国时期,清王朝被推翻,八旗制度解体,为记忆家族曾经的辉煌荣耀和历史源流,编写家谱收族、睦族。满族民间家谱三次修撰高潮,正好与清代满文兴衰过程中的满汉文体书写嬗变历程相契合。

满族民间家谱的基本形制有谱单、谱书两种。谱单一般只记载姓氏,以世系为主,或写有简捷序言。谱书有序言、世系、人物传,或写有祭祀规矩、家训等内容。

满族民间家谱满汉二种文体的书写形式大体上有三种:满文、满汉文合璧、全汉文。正好反映满族家谱使用满文书写向汉文书写的嬗变过程。为更好回答这一问题,下面从满族民间家谱的形制及其组成要素逐一进行说明。

本文的满族家谱专指满族中“满洲”人的家谱。清代“满洲人”以满语言为母语,因此,学习汉语言文字与汉文化融合有较漫长的历史过程,满族家谱书写的满汉文体嬗变,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体现。

一、谱单世系书写的满汉文体嬗变

中国家谱的主要功能与作用就是记载氏族、宗族和家族的血缘关系,因此,世系记载是家谱的核心。通过世系记载,才能“定系世,辨昭穆”^①,而如果缺少世系记载,就不成其为家谱。满族民间家谱形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谱单数量特别大,存世数量几乎达到谱书的四到五倍之多^②。满族民间家谱谱单的修写格式与内容,主要以世系记载为主,仅有少数谱单有寥寥数语是关于家族源流或特殊记事的。由于谱单世系记载直观,一目了然,书写简单,对入关不久开始修写家谱的满族人来说,是一种最便捷的形式。这是满族民间家谱谱单形制数量多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满族学习修家谱的最初形式。例如,现今所能见到修撰时间最早的满族民间家谱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郎氏宗谱》(亦名《镶黄旗满洲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即是以世系记载为主要内容,录入人员可达千人之多,而开篇序言仅几百字^③。所以,世系记载成为研究满族民间家谱文体书写嬗变的第一步。

① (清)乾隆:《御制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序》,《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沈阳:辽海出版社,2002年。

② 据满族家谱搜集专家高新光、张德玉对牡丹江地区以及辽宁地区统计数字,作者搜集整理满族家谱过程中所见也相同。

③ 参见何晓芳、张德玉《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上册,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106页。

满族民间家谱世系的文体书写有三种形式:满文、满汉文合璧、全部汉文。

第一种,满文书写。目前存世的使用满文书写的满族民间家谱基本上都是谱单,而且,只有世系记载的谱单占多数。谱单顶部的中间位置为始祖,以此为始,向下呈树枝形按辈分分布。有的谱单世系只有人名,有的在人名旁边标注八旗职务或爵位,还有少数谱单在左上角或右上角写有几百字符的简短序言,说明家族源流,例如黑龙江梅和勒氏家谱(谱单)。

第二种,满汉文合璧。其中,又分为三种形式:一种是满汉文并行对译,即每一个世系人名的满文书写在左,汉文翻译在右,例如,《新宾乌苏氏家谱》(谱单)、《高氏南园支系》(谱单);另一种是全部世系,上半部分为满文书写,下半部分为汉文书写,例如齐齐哈尔《徐氏家谱》(谱单);还有一种比较特殊,仅在谱名上作满汉两种文体书写,谱单世系皆为汉文,例如《镶黄旗满洲钮祜禄氏弘毅公谱图》^①。

第三种,全部为汉文书写。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立谱时直接使用汉文书写,这种谱单于嘉庆、同治年以后比较广泛,经历光绪年到民国,成为满族民间家谱的主要文体书写形式;另一种是将原来满文翻译成汉文,例如《章佳氏族谱(河北)》^②,同治年间修的汉文谱即是对满文谱进行的翻译。

满族民间家谱谱单多,仅以世系记载为主,而书写形式又从满文向汉文发生嬗变,造成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满族民间修家谱以八旗人口登记的档册,也就是户口册为依据,模仿档册修写而成,这一点,几乎所有满族家谱序言都有说明。例如《白氏源流族谱》:“吾白氏编入正黄旗满洲”,修家谱时“遵正黄旗册档,按支详细添注,不漏一名,创修谱书十六部”。^③《富察氏谱书》:“于光绪三十四年间,于复州城镶白旗阅视档册,抄录先祖名讳以及存歿,均属查清。”^④《赫舍哩氏宗谱书》:“满洲八旗皆有户口策(册)可凭,何必自家另立谱书。”^⑤明确说出满族的世系来源于八旗户口档册。还有另外一些满族家谱世系来源于八旗档册,序言中说明该满族宗族编入某某旗,在某某旗册,或在某某佐领下等。^⑥满族家谱记载世系的谱单数量大,而且著名家族的世系记载工整完备,历经清代数百年人口繁衍仍然清晰不乱,皆因于此。清初五大臣之一的费英东家族家谱《满洲苏完瓜尔佳氏》^⑦世系可达20世;曾任清代副都统的《凤城北红旗瓜尔佳氏家谱》^⑧世系可达14世;清初五大臣之一额亦都家族的家谱《郎氏宗谱》^⑨世系可达17世,10大支。这些家谱世系的男丁数都是几百人或近千人,而且职官、爵位等身份记载明确且有官方档册为依据。正因为满族家谱修编来自

① 辽宁铁岭郎氏收藏。

② 河北碾子峪乡章氏收藏。

③ 何晓芳、张德玉:《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上,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601页。

④ 何晓芳、张德玉:《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上,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461页。

⑤ 何晓芳、张德玉:《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上,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181页。

⑥ 参见何晓芳、张德玉《清代满族家谱选辑》收录的80部满族八旗家谱。《关氏宗族支派谱》:关氏于“金州满洲镶白旗入册”;《完颜氏谱书》:拨入凤凰城界“入正白旗册”;《乌扎拉氏族谱》:“遂隶于盛京镶蓝旗满洲第二佐领管下,籍居奉天省西昂邦牛录”;《萨格达氏谱书》:“随驾至北京正白旗明恒佐领下人。”;《牛庄萨克达氏族谱》:立升“入正蓝旗册”。

⑦ 何晓芳、张德玉:《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上,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1页。

⑧ 辽宁凤城关氏收藏。

⑨ 何晓芳、张德玉:《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上,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106页。

于八旗户口册,因而,有些满人家族直接将八旗户口册当作家谱,如《瓜尔佳氏花名册·关姓族宗谱书》^①和《凤城周氏家谱》^②。还有的家谱直接用档册命名,如吉林赵氏收藏的家谱《乌拉哈萨虎贝勒后辈档册》。

由于满族民间家谱抄自于八旗档册,因此,它必然随八旗档册的满汉文体嬗变而发生变化。

清入关前档案全部为满文书写,与修编满族家谱有关的有三种:《满文老档》是努尔哈赤创制满文以后的第一部使用老满文书写的满文文献,全书共有180册。《满洲实录》成书于皇太极天聪年间,是记述满族源流与崛起的重要官修史书。乾隆年间依据该旧本,制作满、汉、蒙三体插图及满、汉两体不插图的两种文本保存。^③《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共四卷,修于皇太极天聪年间,成于崇德元年(1636),以努尔哈赤生平功绩为中心叙事,记载人物事迹,既是一部史书,也是人物传记的文学作品,^④该书是乾隆皇帝编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重要基础资料。

清入关后满文档案数量大幅度减少,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档案大约有1,000余万件(册),其中满文档案仅200余万件(册)。另外,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省档案馆也存有大量清代档案,其中有一定数量的满文书写档案。以家谱世系为中心的八旗承袭档册,与满族修纂家谱有密切关系^⑤。清初这些户口档册以满文书写,但乾隆、嘉庆朝以后,逐渐被汉文所替代。有学者根据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清代满文档案进行统计:顺、康、雍三朝满文档案文件占绝大多数,乾隆朝满汉档案数量参半,嘉庆朝以后汉文档案渐多,同、光两朝几乎看不到满文档案。^⑥现以《兴京旗人档案史料》为例,就满文使用情况进行对比。该书由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兴京县(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公署档案》^⑦410件(组)文件编辑而成,起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止于1915年,全书正文均以汉文书写,只有同治到光绪年间的9份附件含有满文,其中8份为全满文,1份为满汉合璧。这9份附件是为证明涉事旗人的身世和履历的,由此不难推测,是将以往已经书写成的满文档册直接拿来附录到正文的。这一时期的旗人档案已经全部为汉文,例如宣统元年(1909)“旗人食饷花名册”。^⑧以上足以证明,清代中期以后辽宁地区的八旗档案书写基本用汉文代替了满文。

从目前收集到的满族家谱看,凡自清代嘉庆、道光年以后编修立谱的,鲜有用满文书写的,而且均注明世系由八旗档册抄来。例如岫岩《白氏源流族谱》首修于光绪八年(1882),“遵正黄旗档册,按支详细添注”,修成汉文谱书。丹东《富察氏谱书》修自民国年间,世系抄于光绪三十四年

① 何晓芳、张德玉:《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上,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98页。

② 该家谱由学友收集赠送复印件。

③ 辽宁省档案馆收藏插图本《满洲实录》记载,乾隆帝在《满洲实录》第八卷作有注文:“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敬贮乾清宫,恐子孙不能尽见,因命依式重绘二本”。

④ 参见乌云毕力格、吴元丰《清太祖满文实录大全》,对抗九部联军内容在该书第六册卷二139-192页;萨尔萨大战在该书第八册卷五52-84页。

⑤ 参见吴元丰《满文与满文古籍文献综述》,《满族研究》2008年第1期。

⑥ 张虹:《简述乾隆皇帝对完善满语文的贡献》,《满语研究》2002年第1期。

⑦ 赵焕林:《兴京旗人档案史料》,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

⑧ 赵焕林:《兴京旗人档案史料》,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

(1908)复州镶白旗衙门档册,全为汉文。

二、满语姓氏与名字书写的满汉文体嬗变

满语姓氏与名字,是满族家谱的重要组成元素。放弃满文,使用汉文书写,是满族对汉文化深度认同的结果。

(一)姓氏

满洲有古老的姓氏,仅《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上记载的就有600余个。反映在满族家谱上有三种情况:一是直接用满文书写;二是采用汉语注音式写法,即将满族姓氏用汉文逐一对应满文字符进行音译,《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采取的这种方式被满族民间家谱所采用、传承;三是使用单音节汉字姓氏,这种情况在清代中晚期以后至民国修纂的满族家谱中十分普遍。

上述三种情况中,第一种是满族原生文化传统,现今存世的此类满族家谱仍然有一定数量,主要集中于黑龙江省,以牡丹江流域地区数量为最多。第二种是满族姓氏虽然使用汉文注音,但仍然保留满族原始姓氏。第三种表明满族姓氏完全汉化,此种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1. 满族人有称名不称姓的习俗,“姓”指满文姓氏。满族民间家谱(以谱单形制的家谱为多)往往记载世系,却不记姓氏,姓氏由口述代代流传。流传过程中,或使原来满文姓氏失传,或因不同地域、不同宗支译成汉字发音与写法不同的文字,使同一个满族姓氏演变成数个汉字姓。

2. 满族人以与父祖名字第一个满文音符相近的发音,或者汉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来命名汉字姓,使得同宗、同族但不同支系的满族人有不同的汉字姓。上至朝臣,下至普通满族人,这种情况比较普遍。这是满族人逐渐习染汉文化,学习汉族单音节命名姓氏的结果。比如,乾隆朝大学士尹泰本章佳氏,其祖父伊奇那,其子则名尹继善、尹立善、尹都善。《本溪满族瓜尔佳氏宗谱书》显示:同治十一年(1872)重修谱书时才正式命名瓜尔佳氏,这一满族姓氏由辈辈口传至今,汉字姓为“关”。而其中的一支却姓佟,因为他们有位曾在清代做过副都统的曾高祖叫佟柱,后人即使用他名字的第一个字“佟”为姓。再如《新宾乌苏氏家谱》,据不完全统计,该家族已经演变成吴、穆、包、黄、邵、乌、柏、温、宋(嵩)、代等十几个姓,这种例子在满族姓氏向单音节汉字姓转变中特别常见。再如,清代广州驻防八旗家谱《傅氏家谱》《舒氏族谱》《汪氏家谱》《杨氏家谱》《关氏家谱》等满族姓氏都使用单音节汉字表达,只有《文察氏谱单》使用“文察”满族旧姓,而实际上该家族人员清朝时期即已经使用单音节汉字“文”为姓。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

3. 满族姓氏改写成单音节汉字,还与辛亥革命的政治压力有关。关内八旗在辛亥革命中受到惨烈冲击,^①北京及东北各地满族虽然没有那样严重,但作为八旗子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影响与牵涉^②。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满族人改成汉姓,而且与原有满族姓氏看不出有什么关系。例

① 参见潘洪钢《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第八章《陵谷之变》“排满革命”“驻防旗人之死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美]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 参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辽宁省编辑委员会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5年。

如,当时最敏感的姓氏爱新觉罗氏,在辽宁省各地纷纷改成“常”“洪”“田”“赵”,还有其他外出工作、求学的爱新觉罗家族人员也相应去掉老家的满族姓氏,换成自己命名的姓氏。^①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姓氏为祖先留传,记载一支一脉。在深受汉文化浸润的乾隆皇帝看来,满族人改为汉姓,即等于丢掉“满洲”血统传承,因此,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亲下御旨纠正:

“八旗满洲、蒙古皆各有姓氏,乃历年既久,多有弃置本姓、沿汉习者。即如牛呼鲁氏,或妄称为郎姓。即使指上一字为称,亦当曰‘牛’,岂可直称为‘郎’,同于汉姓乎?姓氏者,乃满洲之根本所关,甚为紧要。今若不行整飭,因循日久,必致各将本姓遗忘同,不得复有知者。著将此交八旗,各省嗣后引见人员,俱将姓氏缮写绿头牌面。仍勒限一年,如一年后经朕询问仍有不能对答者,断乎不可,必将该管大臣一并治罪。再挑选秀女时亦一体遵照,各将姓氏缮于绿头牌面。将此通行晓谕。”^②

从乾隆上谕可以看出,满族姓氏在此时已经上升到“乃满洲之根本所关”的高度,乾隆皇帝继承雍正遗愿,历经十年之功,编纂完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将满洲姓氏及来源厘清,规范满族姓氏汉文注音的用字。从这时起,满族编纂的家谱在谱名或序言中讲明本家族的满洲姓氏,有的为满文书写,有的即使不用满文书写也使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确定的汉字注音的满族姓氏,例如:舒穆禄氏,满文 šumuru;赫舍哩氏,满文 hešeri;伊尔根觉罗氏,满文 irgengioro;马佳氏,满文 magiya hala;富察氏,满文 fuca hala;索卓罗氏,满文 socoro hala 等等。尽管统治者高度重视满洲姓氏问题,但随着满汉文化长期接触、融合,满语姓氏在社会日常生活中仍然逐渐消失,被单音节的汉字姓取代。

满族家谱中满族旧姓被单音节的汉字姓取代,一方面是因为满族人民自觉自愿学习汉文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满族长期被汉文化包围,习惯性的接受汉文化姓氏“授予”的思维习惯。例如,清朝岫岩文学名士多隆阿,满族旧姓舒穆禄氏,《舒穆禄氏族谱》中的第七代祖,于清朝乾隆年间从京城回来,因为发辫粗美而被满语呼之为“孙绰阔”,该家族取汉字单音节姓氏时,按照汉文化的姓名习惯,取了“孙绰阔”的第一个“孙”字为姓,繁衍至今^③。此外,1934年的县志上记载多隆阿时,称之为多雯溪,^④“多”为多隆阿满语名第一个字的汉语注音,雯溪为多隆阿仿照汉文化有名有字传统而取的“字”。这样,多隆阿一人有三种姓氏形式:满语“汉文”注音的舒穆禄氏;以先祖绰号的第一个字为单音节汉姓——“孙”姓;以满语名第一个字的汉语注音为姓——“多”姓。这一事例说明,满族改满姓为单音节汉字姓,也是长期被汉文化涵化的结果。

(二)名字

满族人的命名有自己的特点,经历女真语向满语过度,再由满文命名向汉文过度的历史发展

① 来自于本文作者对沈阳、新宾、岫岩三地爱新觉罗姓氏变化的调查。

② (清)长善等:《驻粤八旗志》,见马协弟主编、马协弟、陆玉华点校注释《清代八旗驻防志丛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③ 来自于白千魁收藏的庄河《多隆阿家谱》。

④ (民国)廖彭、李绍阳修,宋抡元等纂:《庄河县志·艺文志叙》,艺文志卷十七,子目,二,1934年,庄河永源书局印。

阶段。从所收集到的满族民间家谱分析,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清入关前到雍正乾隆时期,大约从归附努尔哈赤的始祖算起应该为第7—9代人,基本上全部使用满语命名。满语命名,一般都比较古朴淳厚,直接取动植物或物件名,少有修饰。满族家谱中常见的满族人名:福尔吉,“furgi”意为牲口脖子夹板;尼雅哈,“niyaha”即“niyahan”意为“狗崽子”;费雅哈,“fiyaha”即“fiyahan”含意为“兽畜的脚掌、蹄掌和玛瑙、纹贝”;伊琅阿,“ilangga”意为“开花的、开放的”;海泰,“haitai”意为“有獠牙的野猪”。有一个更有趣的现象,这一时期,在满语人名中,直接穿插使用汉语地名命名,例如《本溪瓜尔佳氏宗谱书》第八世副都统佟柱,给七个儿子分别取名为:“长安、京都、杭州、南京、苏州、浙江、贵州”;《瓜尔佳氏花名册·关姓宗族谱书》第五世有“西北土”,第七世有“盛京”等名;《赫舍哩氏宗谱书》第三世有“北京”。以地名命名,用来纪念曾经征战的地方。还有以数字命名的如:“七十九、四十八、五十三、六十八”等,这是满族人的命名习惯,据说来自于女真人的命名习俗^①。也有直接以相貌特点命名的,例如“破脸”,见于《瓜尔佳氏花名册·关姓宗族谱书》第四世及《汪氏宗族谱书》第四世。这一时期,满族人命名初显汉化倾向。《本溪瓜尔佳氏宗谱书》第八世副都统佟柱,兄弟共5人,命名为:“佟柱、哈拉、福州、福德、福昌”,后三人已经有“福”字作为范字的意思;《沙济富察氏族谱》第九世,乾隆初年有“傅庆、傅德、傅光、傅勋、傅明、傅向、傅良、傅兴、傅恒”等傅字范字,其中,家谱第十世傅恒的四个儿子分别起名为:“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表面上看似与排辈有关系,但实则仅取汉字吉祥之意,与汉文化严谨的范字排辈分不同。这份家谱的第七世有“福隆保”,第八世有“福隆阿,福长阿,福尔”。很明显,“福”字只是在对满语人名进行汉文注音时所采用的有吉祥寓意的汉字而已。但也表明,这时期的满语起名已经受到汉文化的浸润。

第二阶段,大约为第8—13代人,处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这时期虽然满语命名仍然大量存在,但乾隆朝后期,关内驻防八旗大量改满族姓为单音节汉字姓,向汉文化转变倾向已十分明显。同时,此种倾向渐向关外满族聚居地蔓延,类似汉语言中抽象思维意义上的满语命名大量出现。第一种,使用满语命名而取汉语的褒义,例如:阿克达富,“akdafu”意为“依靠、依赖、信赖”;西喇部,“sirabu”为“使继承”的词根;阿勒德木部,“aldembu”意为“光亮、照耀”;德克济部,“dekjibu”动词“de`jibumbi”是“兴旺、兴隆”的词根。第二种,取汉字祥和吉利之意与满语谐音,例如:秋万塞“ci-owansai”,秋万福“ciowanfi”,铁秋万“tiyeciwon”,皆取“千秋万代”之意;铁寿“tiyeseo”,“长寿”之意^②。第三种,直接用汉语吉祥词汇命名,例如《讷音富察氏增修支谱》^③第十世咸丰朝人的命名:“咸宁、宁珠、果仁阿、五福、果勒敏、七十二、扎坤珠、德宽、祥麟、祥安、德裕、福善保、福天保、福寿保、富隆额、富克进布、富宽、富和、富昌、富庆、富通、恩绶、双宁、恩喜、双贵、崇宁、德昌、德宁、瑞宁、祥宁、德春、德秀、德恺、德恒、德馨”,共计35人,其中只有5人为满语命名,其他30人皆为满语

① 刘文生、朱国忱:《金代女真人姓名解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2期。

② 参见张杰《满族富察哈拉家谱初探——阿城富察哈拉满文家谱研究》,2010年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③ 何晓芳、张德玉:《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上,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443页。

与汉语谐音,取吉祥之意或者共用一字汉语为本家同胞命名,但没有汉语严格的排辈范字。第十二世则完全以汉语命名,“常铜、常升、常山、常锐、常佑、常锬、常润、常瑞、常钧、常庆”,明显表现出汉语严格的排辈范字。另外有一种特例为:使用满语命名,使用汉语命字。清初,满族上层贵族知识分子就已经风行使用汉语命字,例如著名诗人纳兰性德,字容若;图尔宸,字自中;顾八代,字文起等。在这一时期,满族中下层也使用汉文给自己命字,例如:《正白旗舒穆禄氏族谱书》^①系清代辽东名士多隆阿家谱,多隆阿为满文名的汉字注音,而汉字名廷鼎,字雯溪。这种命名方式在清朝乾隆中后期十分普遍^②。

第三阶段,大约为同治、光绪、宣统到民国。这一时期,满族家谱中用满语命名已经成为个别现象,普遍使用汉语命名,并且开始排辈范字。主要原因是,满族从始迁祖顺努尔哈赤到清朝入关,经历二百多年人口繁衍,人口呈几何倍数增长。例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至清末的宣统元年(1909),辽宁岫岩满族人口从1,000人升至46,830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28.7%。^③再以凤城赫舍哩氏为案例,始迁祖罕都瓦尔达将军一人生三子,三子生九子,九子生三十四子,到光绪五年(1879)修立家谱时,已历经近二百年,繁衍为十世十三支系,达到7,000余男丁,再加上妻、女(该家谱不记载女儿)等妇女人口,该赫舍哩氏可达20,000余人口。满族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同一个姓氏便分化出不同单音节的汉字姓,仅凤城赫舍哩氏就分出赫、何两姓,散布于凤城以外的本溪、宽甸及黑龙江双城等地。面对如此庞大、四处散布的赫舍哩家族人口,为达到睦亲族,分尊卑,序长幼,联婚姻的目的,编纂家谱无疑是最好的办法。鉴于汉族编纂家谱从形制到格式,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可借鉴的经验,满族人修家谱时很自然会进行效仿。该家谱序言对此阐述十分清楚,抄录于下:

“独有我赫舍哩氏始祖,从龙入关,忠以持身,宽以抚众,实有功德,故世卜其昌,子孙繁盛,有九男同母之瑞。惟是齿生日众,一户分而为千门;世远年湮,因名变而为异姓。视骨肉如路人者,往往然也。今我后辈,痛此积习,欲因疏以及亲。恨无蚁术,爰由委而溯源,……故与本族人商议,欲将凤凰城一支派修立谱书,使成殊归于一本,庶几自今而后承祧不紊。……亲睦宗族,何若修此谱为妙也。”^④

现存的满族家谱,如同凤城赫舍哩氏这样“齿生日众,一户分而为千门”的不下几百种。而家谱区别辈分的最好办法就是“范字”,清朝爱新觉罗氏从雍正朝始即开启这一办法,但在满族民间家谱中极少使用。

清雍正朝大学士高斌家族《高佳氏家谱——奉天高佳氏家谱》就是由满语命名转向汉语命名的最好例证。该家族本为汉人,清入关前归附后金,习染满洲语言文化,使用满语为子孙命名,表明其

① 何晓芳收藏复印件。

② 参见(清)台隆阿、李翰颖:咸丰朝《岫岩志略》,该书记载的职官、选举、人物,涉及的满族(洲)人除有满文名之外还有汉文命字。该书第一作者台隆阿,字湘湄,爱新觉罗姓氏红带子,镶黄旗。

③ 岫岩满族自治县数字科技馆网站。

④ 何晓芳、张德玉:《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上,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

完全融入满洲社会。该家族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续修家谱时,启用汉文“范字”排行辈,《跋语》道出其无奈,也可作为满族民间家谱为什么实行汉文“范字”的解读:

“余家祖居奉天辽阳,自国朝来归,迄今百有余年。仰承恩命,赐隶满洲镶黄旗,子孙繁盛,宗支大茂,已八世矣。而两世相国,功德益崇,亦叶增辉。大凡子姓命名皆满洲名字,未若先代编定字号也。诚恐嗣后生齿日繁,或致名序混淆,间有相同名字者,甚或孙犯祖讳,子列父行,其谬殊甚。自今宗谱续修,删繁就简,支派昭然,子孙命名务必详考,倘有犯者,即行改正。”^①

由于排行辈的现实需要,同治年以后修写的满族家谱皆记载用拟定的诗文体命名“范字”。例如,《本溪瓜尔佳氏宗谱书》同治十一年修谱时拟定20字:

安恩文和绍 显荣延志连 华训铭殿复 祝禄应廷绵

再如,《赫舍哩氏宗谱书》光绪五年(1879)修谱时拟定28字:

德承吉林贵崇荣 英明景会乐辅清 忠良维国安全志 世守纯贞保泰平

以上两种诗文体“范字”实用、可行,因而,在满族家谱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普遍应用。

三、谱书书写中的满汉文体嬗变

满族民间家谱以谱单和谱书为两种常见形制,谱单是满族民间家谱的初级形制,突出记载血缘世系的功能性。而谱书则是谱单进一步发展的形制,内容丰富。一部好的谱书可以称之为—部好的文学作品,如果是手抄本,还有书法价值。因此,满族民间家谱满汉文体书写嬗变,是满族民间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写照。

(一) 满文谱单转写为汉文谱书,传承延续满族文化

相对于谱单的谱书,除记载血缘世系之外,还需要有诸如序言、题与跋、得姓来源、迁徙源流、人物传记、荣恩禄、家训、家规等更多的元素组合,从而使血缘世系记载更丰富多彩,这是中国家谱几千年发展形成的完善形态,满族修家谱若要学习和借鉴,则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汉语言文学修养。

为掌握汉文化,满族人迫切需要学习汉语文。但满族人最初对汉语文很生疏,只有将汉文典籍翻译成满文才能完成阅读。皇太极时期对中央机构效仿明王朝进行改革时,专门设立文馆、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重要职责之一是翻译汉文典籍。天聪八年(1634)开科考试时又专设翻译科,选拔翻译汉文典籍人员,主要翻译儒家经典和历史书籍。清入关后,翻译汉文典籍工作持续进行,并加大了对文学作品的翻译量,顺治到康熙朝,是翻译汉文典籍数量最多的时期。李德启、于道泉两位先生合作编著《满文书籍联合目录》1册,共收录满文图书419种;富丽编著《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共收录文献1,122种;黄润华、屈六生主编《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共收录图书1,015种;卢秀丽编《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目》,共收录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266种;张本义主编《大连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图书综目》,共收录满文和其他民族文字合璧图书

^① 何晓芳、张德玉:《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上,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851页。

416种;对国外机构收藏的满文图书整理编目的外国学者有蒙古国拉·卡西格、俄罗斯雅洪托夫、瓦西里耶娃、英国纳尔逊、德国稽穆、日本松村润及河内良弘等。满族人的文学修养由上述书目可窥见一斑。

随着满族人掌握汉语言文字水平能力的不断提高,文学创作也由最初使用满文效仿汉文文学作品过渡到直接使用汉语文进行中国传统文学诗词歌赋及散文创作,部分人的创作水平甚至可与汉族文学家相媲美,康熙和乾隆皇帝就可称之为汉语文学大家,在皇帝的带动下,不仅清宗室文学人才辈出,而且形成了满族文学家群体。清初顺治到康熙年间满族人仍然盛行满语、满文,但却已经产生著名满族诗人鄂貌图、高塞、图尔宸、禅岱、顾八代,费扬武及享誉有清一代文坛的纳兰性德,他们都擅长汉语文诗歌创作。清入关以后将汉语文列入八旗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开设旗人科举,成为满族入仕的另一途径。满族上层学习、崇尚汉文化的风气,对整个民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由此大大提高了满族人的文学修养。

民国时期恩和刊印的《八旗艺文编目》,辑录清代旗人创作的1,770余篇诗文,充分体现了有清一代满族的文学成就,满族编写谱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入关后出生的满族人,生活稳定,已经有学习读书的条件,不再为缺少“文学”而苦恼,实现编写谱书的愿望成为可能。自乾隆、嘉庆年间始,再到同治、光绪年间,汉文谱书形制已经成为满族人续谱或立谱主流。

谱书的满汉文体书写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续修家谱。将先前满文旧(老)谱(单)翻译成汉文重新抄写。满族人在清初编修家谱以谱单居多,因文学水平低,故而从八旗档册直接抄写成谱。续修家谱时在原有世系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补充内容,成为谱书。以《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为例,该书共计收录50部满洲家谱,其中有16部明确说明原家谱为满文,续修家谱时转写成汉文。另有5部家谱虽没有明确说原为满文,但也可以根据世系记载等情况判明其原为满文。^①

第二种,初修家谱,即“立谱”,直接使用汉文书写,形制为谱书。再以《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为例,该书共计收录50部满洲家谱,其中有32部(份)为光绪及民国年间初修“立谱”,全部使用汉文书写,谱书形制已经成为满族家谱的普遍现象。望族殷实之家的谱书制作美观,往往请达官显贵之人作序、题字,并且效仿汉人起堂号,家谱有了装点门面的意义。还有一些满族文学之士亲自用汉文撰写家谱,例如本溪《吴俄尔格氏家乘》作者吴宗阿为进士出身,谱书中收录有本人汉文诗作;庄河孙家堡《舒穆禄氏家谱》为咸丰朝文学家多隆阿汉文亲手抄写,可谓书法上品。

满族家谱谱书形制,由满文转向汉文,从民族身份视角来看,似乎是满族丢掉了原始文化,但从民族发展进步的视角看,满族善于吸收借鉴其他民族先进文化而发展传承本民族文化,将传播范围有限的满文家谱转变为汉文后流传的更为久远。

(二)以汉文书写谱书,兼及满文

满语文是满族的母语,不仅承载满族文化,而且承载满族情感。为传承延续满族血脉与文化,

^① 以何晓芳、张德玉编:《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为统计,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

满族人虽自觉、自愿选择使用汉语文书写家谱,但仍然留恋自己的母语,所以出现了在汉文书写的谱书中兼及满文的情况。总的说来,书写谱书主要有四种形式:

第一种,满文文学作品收录于汉文写作的满族民间谱书之中。入关后长成的八旗子弟中具有深厚汉文学修养者不乏其人,这些人一般被家族推选出来修写谱书,一些作品也被收录于家谱之中,例如前文提到的《吴俄尔格氏家乘》的作者为康熙年间的进士吴宗阿,他将自己用汉文写作的10首诗收录于家谱之中。此家谱中还有表达冤情的汉文“哀矜录”,说明吴宗阿已经可以完全使用汉文来表达感情。但与此同时,该家谱收录先祖撰写的满文《贞节碑文》、满汉文合璧《潘氏总论》,则又体现出满族留恋满语文的一种民族心态。另有笔者收集到汉文撰写的《赵氏宗族谱书》,收录有满文《三字经》;汉文撰写《宁古塔那穆都鲁氏家谱》,另撰写有满文的《那氏先祖列传》。^①

第二种,谱书全文为汉文书写,但在封面版心位置上书写满汉合璧谱名。例如《厢黄旗满洲钮祜禄氏弘毅公图谱》,“厢黄旗满洲钮祜禄氏弘毅公图谱”14个字,从上至下,汉文在右,满文在左。该谱书为清代中晚期编写,居住辽宁的该家族已经通用汉文,很难全篇用满文书写家谱,但在封皮上保存满文书写的谱书书名,有标识满族家谱的意义。

第三种,谱书前一页简短序言或几代世系表上的世次说明为满文,满文之后全部由汉文接续,例如《那拉氏族谱》,其满文部分作为先祖遗迹保存,表达对先祖追思之意。

第四种,谱书前部分为满汉合璧,后续全部为满文。例如《沙金富察氏家谱》;还有全谱书皆为满汉合璧的,例如《郭辰瓜尔佳氏家谱》。

无论上述哪种情况,都表现出满族谱书创作中浓郁的民族情感。

(三)收录祭祀规则,体现满族谱书特色

满族萨满信仰历史悠久,清入关以后虽承续明朝华夏正统,但萨满祭祀传统旧俗未改。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至乾隆,满族入关已经百年,原有氏族因八旗驻防而分散于全国各地。由于满族深受汉文化熏染,不仅满语逐渐丢失,而且将满族旧姓改成单音节汉姓,随之萨满祭祀传统也在逐渐弱化。清朝一向视“满洲乃国家根本”,奉行“首崇满洲”国策,乾隆皇帝将恢复满族旧姓与萨满祭祀旧俗作为大事,登基伊始即命修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乾隆九年(1744)告竣。乾隆十二年(1747)颁行《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将萨满祭祀规范化,强调固定祭祀仪式和满语祝词,目的为“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不坠”。在规范萨满祭祀过程中,乾隆皇帝进行了一定改革,推行规范的祭司主持的萨满祭祀仪式。乾隆皇帝的改革降低了萨满的作用,突出了氏族祖先崇拜,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编纂的主旨相合。经过这次改造,满族各姓虽然出现相似的“神灵”,但各姓的家祭神仍然被允许在氏族内传承,而且形象化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的归附努尔哈赤并随之建功立业的始祖。这样,《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刊行,不仅推动满族民间修写家谱,还将满族家谱与祭祀密切联系在一起,祭祀规则也成了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家族统一遵守的传统。

满族人家的西山墙安放祖宗板,中间摆放祖宗匣,匣内存放家谱,另有香碟数个分列摆放于祖

^① 何晓芳收藏,因印刷不便,没有收录于《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之中。

宗匣两侧,代表不同的“神”。^① 尽管不同时节祭祀不同的“神”,但祭祖是祭祀的核心。清代满族为了承袭挑丁验证身份的需要,每一家族都有家谱,同样,每一家族也都有祭祀规则。祭祀规则最初由家族口头代代传承,后来专门记之于文本。以《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为例,总计收录满族(洲)家谱50部,其中收录祭祀规则或相关内容的家谱有20部,几近二分之一。其余没有收录祭祀规则的家谱则是因为该家族将祭祀规则单独成书。因祭祀规则细致复杂,文字量大,因此需要单独记录于文本后。祭祀文本一般与家谱共同存放一处,一般都放置在祖宗板上。单独记录祭祀规则是满族的旧有传统,将祭祀规则录入家谱,则是顺时宜而为之权宜之策,究其原因,大致有两点:

一是满族入关以后八旗驻防调拨频繁,同姓家族随时迁徙分往各地。即使聚居一地的同姓家族,经过几十年繁衍之后,也分支析居出数十个家族之多。以过去的信息和交通条件,很难保持联络。满族有“随名姓”的习俗,分居异地的同姓各家族,在不相往来的情况下,各自另行改汉姓,以官名、地名、祖上名字首字等为姓,五花八门。《那氏族谱》“序言”中对此情况有记载:

“吾叶赫那拉氏自远祖奇玛瑚从龙入关,九子分支,有随入北京者,有于沈阳、辽阳、开原、复州、熊岳各城驻防而以为家,不相往来。

以前记事类皆用满文,而记载亦多简略,更以满人一入仕途即随官姓,如汪尔塔之后人改姓王,并官姓亦不以其字矣。胜清康熙朝相国明珠,本叶赫那拉氏,而其子成德则名为纳兰,音同字不同,此又一例也。吾友三多将军自称系叶赫那拉氏,杭州驻防,兼为同宗,而其旗则蒙古镶黄,则又是同宗不同旗之一例也。……深虑代远年湮,所有祖宗遗留之规矩礼法渐至失传,湮没无闻,乃发起修宗谱。弟庆铎等实执行者赞之,乃追溯羊山公以下世表、坟墓图,以暨冠婚丧祭各仪,注叙述一篇。”^②

应对上述情况的妥善措施就是将该家族的祭祀规则缮写在家谱之上,以示不忘先祖及先祖定制,保持本家族祭祀传统。因谱书比谱单有更多的文字记载空间,可以批量印刷,分藏各地,这样,同一个姓氏家族无论分支何处,都有规则可遵行。

二是晚清到民国,经历重大社会动荡,许多满族人对萨满祭祖等事已不再像以往那样虔诚、笃信,满族传统也逐渐丧失。编修家谱时将祭祀规则录入其中,是对后代传承的一种鞭策,意在期望通过遵守祭祀规则,提醒后代勿忘满族先祖根本。例如《瓜尔佳氏宗谱书》叙:

“凡人有五种,是满、汉、蒙、回、藏也,唯我瓜尔佳氏亦系满人。又尝闻礼莫大于祭,而祭天、祭先尤其綦重者也。吾先祖聪明睿智,虽不厘心于祀典,而祀典自无不详明。延乃后裔,德凉识浅,纵于祭祀之事有身亲目睹者,非见而辄忘,即冥然罔觉。则隕越遗羞,畴知操跪之有节;更颠倒失序,哪识俎豆之几何!滋于缣緙中获一书简,内载祭祀之事,差觉细腻。然于始终

① 根据作者满族民间调查,不同姓氏,或相同姓氏不同家族的祖宗板香碟数目不同,多数为五个,也有三或七个。分别代表哪位“神”说法不一,归纳起来常见的说法大致有:“菩萨”、“佛爷”、“神(青)马”、“天神”、“土神”、“长白山神”、“老罕王”。但辽东地区的满族,常见于另一种说法,几个香碟就代表这个家族从长白山几道沟下来的,五个就是五道沟,七个就是七道沟,依此类推。但根据满族祭祀传统及乾隆《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考察,应当以代表“神”的说法为准。

② 何晓芳、张德玉:《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上,《那氏族谱》,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363页。

条理不无遗误之处,爰就族中知者互相参补,粗成斯编,以志不忘云。”^①

满族谱书除收录祭祀规则外,有的还将萨满祝词一并收录,以满语汉文注音书写,例如《瓜尔佳氏宗谱书》《瓜尔佳氏关姓族宗谱书》《佛满洲佟佳氏全谱》《交罗哈拉佟赵全书》。萨满祭祀祝词要求使用满语诵唱,使用汉文注音也反映出满族民间口头满语逐渐衰退的情况。

结 语

上述满族家谱书写上的满汉文体嬗变,反映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有清一代特别是早中期,虽然统治者一直强调维护“满洲之根本”,强调使用“国语”,但汉化日深的趋势并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在满族民间家谱书写文体上,最初“借用”汉文来表达满族家谱之原意。清中期以降,满语文因远离现实社会需求而逐渐衰落,采用汉文书写,保留部分满文成为此一时期满族民间家谱的主要修撰方式,这种修谱方式既反映出修谱者在历史转折期的一种现实选择,又体现了修谱者期望借家谱延续自身民族血脉、文化的意图。这个过程似乎可以概括为从“借用”到融合,满族民间家谱今天成为中华文化宝库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责任编辑:孙海静

^① 何晓芳、张德玉:《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上,《瓜尔佳氏宗谱书》,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48页、第49页。

of palace ginseng, and gradually replaced its market position. Finally, the palace ginseng withdrew from the market. It is the epitome of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the palace and the epitome of the serious impact on domestic commodities.

Keywords: Neiwu Fu's ginseng; foreign ginseng; sale; Imperial power; goods

A Review of Genealogy Books of the Garrisoning-Banners People..... Pan Honggang 043

Abstract: The content in Genealogy books of the Garrisoning-Banners People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Soldier-selection, Status inheritance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s. So, both the Garrisoning-Banners People and Central Governmen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Genealogy books. Many details of social life in these Genealogy books could be used as a supplement to regularly historical records. In addition, those Genealogy books often shows in "Mural Genealogy" form, which forged by special develop mode of the Garrisoning-Banners.

Keywords: Qing-Dynasty; Garrisoning-Banners; Manchu; Genealogy books; Mural Genealogy.

An overview of the family tree of the Manchu in Lingnan

——Taking the Manchurian genealogy of eight banners garrisoned in Guangzhou as the center Shen Lin 051

Abstract: The Manchu in Guangzhou originated from the garrison of Eight Ba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genealogy of the Manchu in Guangzhou ha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garrison of eight banners. It records the military position of eight banners, the clan of eight banners, the battle of guarding the border and the name of multi syllable Manchu. It also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ngnan garrison, such as the emphasis of "The ancestor of Guangzhou", no record of Shaman culture and detailed record of ancestor funeral. The influence of Lingnan Sinicization in the ancestral name of the genealogy and the influence of Lingnan political movement in the genealog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re the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eight banners and Manchuria in Lingnan ethnic group, as well as the rare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garrison history of Guangzhou Eight Ba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modern history of Lingnan.

Keywords: the origin of Manchu in Guangzhou, the garrison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genealogy, the influence of Lingnan Modern Political Movement on genealogy

A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Manchu-Han Writings

in the Manchu Folk Genealogy He Xiaofang 063

Abstract: Created before the Manchu entry into the Central Plain, the Manchu language was established as the "official spoken language" and "official written language" of the Qing Dynasty after its foundation, not only being used throughout the Qing Empire, but also acting as a bridge for East Asi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to underst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nchu language, however, fell into decay when the Qing Empire was in its heyday, resulting from the strong demand of the Manchu culture for its ow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being independent of the dynasty's will.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writings of the Manchu genealogy from the Manchu language to the Han language,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how the Manchus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the genealogy of the Han ethnic group, improve the writings of their genealogy using the Han language, and integrate themselves into the Han culture of genealogy completely.

Keywords: Manchu genealogy; Manchu-Han writings; genealogy archives; Manchu names; evolution

The New Proof of Xunzi's Writing of "Xunzi (荀子) Chengxiang (《成相》)"..... Yao Haitao 076

Abstract: Whether the author of Chengxiang is Xunzi himself or not, there are two schools of affirmation and negation in modern academic circles. Start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title of *Xunzi Chengxiang*,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ommentators' opinions,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mpromise, and defines the basic meaning of *Chengxiang* as a mixture of polysemy. From the six aspects of evidence exclusion, inner proof of thought, self proof of text, content involvement, biography of *Zuo-zhuan* (《左传》), and style and rhetoric, this paper tries to prove that *Chengxiang* was written by Xunzi himself. The genre, order and the conjecture of Xunzi's physical condition in his later years are not the evidence of non Xunzi's works; This article can find out Xunzi's unique thoughts, proper terms and some critiques of Mozi (墨子); There are several original, exclusive and symbolic discourses of Xunzi in this chapter; The events, time and characters recorded in this article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e of Xunzi; The collection is the historical events, words and phrases of *Zuo Zhuan*, and the possible connection with Xun Kuang Ji to prove the relationship with Xunzi; The formula, style of this article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Xunzi. In the